“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王 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72; 17855306362@163.com)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双减”政策背景下, 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借助文化再生产理论, 本文揭示了家庭教育投入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现状, 以及这些变化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影响教育不平等。研究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 家庭教育投入从依赖校外辅导班转向加强家庭内部学习资源和父母参与。这种变化增强了家庭社会资本, 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但同时也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在教育资源获取上的差异。本文进一步解释了家庭如何通过教育投入在子代中再生产特定的文化资本, 这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展现出显著差异, 影响孩子的教育成就和社会流动性。“双减”政策虽然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依赖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教育公平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了缩小教育不平等, 建议加强对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支持, 优化教育资源分配, 增强所有家庭的教育能力, 以缓解教育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 双减政策; 家庭教育; 教育不平等; 文化再生产

引言

在今“双减”的政策实施的教育背景下, 对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规范校外培训活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内容提出了要求, 为进一步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要求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学生在校时长的缩短虽然客观上减轻了学生在校内的学习负担, 但由于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交给了家庭部门, 影响了家庭在课堂外的教育投入, 所以当下家庭教育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然而,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课外辅导时间和支出方面的巨大差异会影响他们的升学考试成绩和认知能力, 从而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继而长期影响到代际收入的差异。本研究旨在分析“双减”政策实施后, 家庭教育投入的变化情况并探讨当前我国教育不平等的现状以揭示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1 研究综述

有关家庭教育投入和教育不平等的概念界定。家庭教育投入是指家庭为子女教育所付出的各种资源, 包括物质投入和非物质投入。物质投入主要包括教育经费、学习用品等; 非物质投入主要包括家长陪伴、教育方式等[1]。西方学者就家庭教养方式展开论述研究。鲍姆林德(D.Baumrind)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三种: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马克比(Maccoby)和马丁(Martin)在此基础上将教育方式分为权威性、专制型、溺爱型和漠视型[2]。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子女的性格形成以及行为表现, 这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不平等的概念在文艺复兴的时期被提出, 到19世纪, 其内涵已经基本完善。卢梭在1962年提出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 认为家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等先富因素以及学前教育都与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有关。在20世纪,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普通阶段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 认为教育扩张是经济和政治变迁的一种反应[3]。因此, 教育的获得与阶层密切相关。随着对教育不平等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逐渐完善,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教育不平等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地位竞争理论认为, 最好的工作职位总是留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成为社会精英需要通过优质的教育来实现[4]。同时, 教育的获得导致了工

业化社会分层，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的发展推动社会流动[5]。诸多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会对个人前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有关家庭教育和教育不平等的困境研究。在现代化社会中家庭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但不同家庭之间可能会互相攀比导致教育“内卷”，教育方式多元化导致无从选择等[6]。随着家长主义浪潮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作用愈发凸显[7]，最终导致家庭与学校关系的紧张，与社会教育的合作卷入功利化的无视与妥协[8]。当家庭教育的首要地位被学校教育取代，家庭教育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9]。正如卢曼所说，家庭的功能被缩减到准备和过渡到学校组织的教育阶段[10]。“双减”政策自落地以来，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课业负担过重以及非理性教育竞争的问题[11]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破解教育内卷化的作用[12]，但也看到了家庭教育新的表现形式[13]。

“双减”带来了家庭策略与家庭类型的分化[14]，投资行为和方式转变[15]，也为治理家庭教育带来了新挑战。

学者们一直以来对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较为关注，存在着家庭教育，校际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质量差异大的问题，这些研究都涉及义务教育教育不平等[16]。伴随着“双减”政策的颁布，学者们研究提出落实的困境，同时提供多种视角观察。但是针对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相关研究较少，家庭教育投入差异影响教育不平等研究尚且缺乏深入的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也不够多样，需要进行补充。本文将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在解决“双减”政策贯彻落实问题的过程中，重点研究关注家庭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借鉴先前学者对于解决教育不平等提出的路径和策略，以更好更快地促进完善现代化教育体系，提高教育水平，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推动家校社育人协同合作[17, 18]。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框架

文化再生产理论主要探讨社会上层阶级如何通过教育系统传递和再生产其文化资本，从而维持社会地位和权力结构。在教育过程中，特定的价值观、知识、行为习惯被传授给下一代，这些元素通常更符合上层社会阶层的文化标准。本文通过文化再生产理论深入地理解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如何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教育不平等，揭示教育如何在社会阶层之间传递和加固文化资本。该理论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负担并促进教育公平，但家庭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背景可能影响政策的实际效果，出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19]。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会产生家庭教育投入的文化资本转变。“双减”政策改变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方式和重点，这可能影响文化资本的传递和积累。家庭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的学习环境和家庭内的教育资源，这要求重新考虑文化资本在家庭内如何被再生产和传递[20]。同时，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教育系统往往倾向于再生产社会阶层的分层，即上层社会的文化资本更容易被学校体系认可和奖励。家庭教育投入的变化可能仍旧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异。例如，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能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来增强其子女的文化资本，而这些机会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可能难以企及。

2.2 研究方法

为了解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现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式，访谈形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面对面深度访谈、语音电话访谈和线上文字访谈等多种方式。本文研究遵循信息饱和原则作为抽样终止的标准，在安徽省W市的三所中学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了13位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中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通过采用访谈法，将探寻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家庭教育投入变化，了解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包括家庭教育投入时间，金钱等。第二，政策执行情况。探讨“双减”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其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第三，影响家庭教育不平等的因素。通过研究家庭教育投入差异分析探讨其对家庭教育不平等影响机制。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一览

样本编码	户籍类型	受教育程度	子女性别	子女年级	子女学校
A01（张同学母亲）	城市	高中	男	7	Y 中学
B02（李同学父亲）	农村	初中	女	9	F 中学
C03（王同学母亲）	城市	高中	女	8	F 中学
D04（郑同学父亲）	城市	本科	男	7	Y 中学
E05（王同学母亲）	城市	高中	男	9	F 中学
F06（丁同学母亲）	农村	初中	女	8	Y 中学
G07（徐同学父亲）	农村	初中	女	8	S 中学
H08（胡同学母亲）	城市	高中	男	8	Y 中学
I09（秦同学母亲）	农村	初中	女	7	S 中学
J10（王同学父亲）	农村	小学	女	8	S 中学
K11（张同学母亲）	城市	高中	女	7	Y 中学
L12（刘同学父亲）	城市	初中	男	8	S 中学
M13（方同学母亲）	城市	初中	男	9	F 中学

3 “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及教育不平等的现状

3.1 “双减”后我国家庭教育投入变化现状

“双减”政策实施后，以 W 市的中学为例，家庭教育投入出现了以下显著变化：

3.1.1 校外培训总体支出减少

由于“双减”政策的颁布，大量课外补习班被叫停封禁，家长对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的投入大幅减少。在政策实施下延长了在校时间，给予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老师指导的空间，提升了学习效率。正如 B02（李同学父亲）所说“盲目补习效果不大，孩子需要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查缺补漏，在校时间延长挺好的，有学校老师看着孩子学习，也为家长省心。对我们这些工作繁忙的家长来说，省去了送孩子去校外‘小饭桌’自习的时间和支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投入上，也深刻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整体格局。家长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更加注重校内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家庭内部的陪伴与教育。例如，A01（张同学母亲）在访谈中提到：“孩子成绩也还不错，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课余时间做一些课后习题巩固课堂知识就行。‘双减’政策的实施能让孩子去发展兴趣爱好，锻炼身体。我也会经常陪孩子去户外锻炼，闲暇时间还会和孩子一同去学习舞蹈、瑜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3.1.2 家庭教育资源增加

由于现今升学压力大，教育竞争压力也大，家长和学生对于学科教育不敢有一丝懈怠。在“双减”政策的颁实施后，家长开始更多地投资于教育资源，如图书、线上教育等，更注重孩子在家里的教育与学习。正如 C03（王同学母亲）所说：“学校的作业变少了，孩子的课余压力减轻了，这正是给家庭教育提供了发展空间，借此来实现弯道超车，孩子通过上第三方机构网课的方式以及加练课后资料的方式来巩固孩子在校内学习的知识。学校里发的学习资料对于我家孩子来说根本不足以巩固课上知识，我们家长要督促孩子做更多的习题，为孩子的进步准备足够多的燃料。青春期的孩子正值叛逆期，没有家长严加督促，他们很难靠自己的自律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3.1.3 时间投入增加

家长在陪伴孩子学习方面的时间投入增加，包括辅导作业、共读书籍、学习技能等。此外，部分教育机构在“地下”进行补习，家长和学生花费更多孩子进行学科补习。部分中产家庭在“校外学科类培训”受限的情境中，转而通过“家庭内补课”来维持乃至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D04（郑同学父亲）表示：“之前孩子

周末参加补课班，我们家长确实会轻松，但是孩子上大班课感觉进步不大。现在补课班被教育部清退了很多，我家孩子也不去上补习班了，现在我每天会陪伴孩子学习，会帮助孩子批改作业，共同研究错题，闲暇之余会监督孩子读名著，并要求孩子复述给自己，以检验孩子在家的学习质量。孩子进步变得明显了，学习成绩获得了显著提升，就是家长会累点，没办法，都是为了孩子嘛。”这种变化体现出布迪厄所强调的“文化资本”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家长通过与孩子共读、参与学业辅导等行为，不仅传递知识技能，更内化了一种“学术性家庭文化氛围”，从而有助于孩子在教育体系中保持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并未完全退出市场，而是通过“地下化”“隐性化”的方式继续提供学科辅导服务，从而造成家长与孩子更高强度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例如，E05（王同学母亲）提到：“很多补习班表面上没有了，但是很多转地下了。他们周日不能进行补习，都挑周中晚上补习，孩子们经常放学后过去，补习到晚上十点。其实我们也不想看到孩子这么劳累，但是孩子马上中考了，一点都不能松懈。家长晚上要负责接送孩子，还担心孩子饿了、冷了，反倒比之前花费的时间、精力更多。”

“双减”政策在表层减少了机构性培训供给的同时，也促使家长通过更隐性、更高代价的方式“绕开”政策限制，以确保孩子的学业竞争力不被削弱。进一步来看，这种家庭教育投入方式的分化，不仅与家长的文化资本相关，也与经济资本、时间资源的可支配程度密切相关。能够全程陪伴、批改作业、挑选阅读书籍的家庭，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而愿意在地下补习中继续高额投入的家庭，则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这使得原本由校外培训主导的“教育消费”结构，转变为以家庭内部资本配置为核心的新型教育投入机制。

3.1.4 情感和心理健康加强

家长更加注重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更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以应对学习和生活压力。在“双减”政策颁布后，为家庭教育开拓了空间，重视教育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更加上心了，陪伴孩子学习的时间也更多了，对孩子的了解更深入，对于培养亲子关系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正如F06（丁同学母亲）所述：“国家宣传教育减负，对我们家长来说确实感受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慢慢就发现之前对孩子确实太严苛了，现在好像有点理解孩子了，我觉得作为父母不仅希望孩子成绩优异，更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三观健全，身体素质优良的孩子，比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快乐成长，我们也会更重视他们的身心健康。”

“双减”政策所释放出的课余时间，为家长更多地介入教育过程提供了结构性机会，使得部分家庭能够以更柔性、更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孩子成长。家长对孩子学习习惯、心理状态的深入了解，也为建立积极的教育支持网络打下基础。在减负政策创造的“教育松弛”空间中，家庭对孩子的认知逐渐回归到人格成长与心理发展层面。这种转变这不仅提升了家庭教育的质量，也体现了家庭教育功能的拓展。

3.2 家庭教育差异现状

尽管“双减”政策旨在缓解教育不平等，但研究发现在“双减”政策实施数年的当下仍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双减”政策的实施，家庭教育在教育事业中占据更高的地位，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更大。通过访谈W市的家长，了解探讨家庭教育差异对教育不平等产生影响的因素：

3.2.1 区域间家庭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长期以来实行的“城市优先”的教育政策，把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城市中去，广大的农村地区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城市优先取向”的教育政策，实质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制定教育政策，分配教育资源，它所体现的是城市学生的教育诉求，使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学生陷入极大的不公平。G07（徐同学父亲）指出：“我们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比城市差远了，这两年农村学校的退休老师退休的越来越多，师资紧缺，学校位置又偏，根本没有老师愿意来乡村教书，都是靠教育局派遣重点中学老师来支教两年然后离开。而且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城市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本没法比。我们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把孩子送去城市补习文化课，孩子表示城里老师教授的知识有的本校老师不要求掌握，而且城里老师的练习题质量比本校高很多，发现和城市学生的差距很大。”可见，一直以来城乡的家庭教育存在很大差异，城市学生仍可通过家庭教育补偿机制延续优势，而农村家庭则因结构性条件受限而缺乏有效替代路径[20]。

3.2.2 家庭经济水平导致家庭教育资源不平等

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家庭能够快速适应“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通过增加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如购买高质量的在线学习材料、线上教育资源）以应对校外辅导的禁令，从而保持或提升教育质量，形成“隐性教育消费”的新常态。H08（胡同学母亲）就是如此“我的孩子一直请家教进行一对一辅导，作为父母当然会尽可能满足孩子的要求。孩子在闲暇时刻我也会送孩子去学习骑马、钢琴。我认为一对一教学更加省时省力、更高效。父母挣钱就是给孩子花嘛。孩子从小到大，只要是学习上的消费我们夫妻从来没有犹豫过，为此购入学区房，也是为了孩子能考上好高中”。

相比之下，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在资源重新配置上面临困难[21]，难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学习支持，获取教育资源较少。I09（秦同学母亲）提到：“我们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多么优良的学习环境……小学的时候他身边同学都在学习钢琴、美术什么的，我们也没有条件送孩子去兴趣班，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读好书才是穷孩子的正道。”J10（王同学父亲）补充：“我的孩子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前参加的补习班以‘心理咨询班’的名义在周中的晚上上课，我们家距离市中心又很远……真的很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不仅未必减少，反而在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家庭中形成新的压力，暴露出政策执行效果在不同阶层间的“差异性接受”。教育消费方式的分化，使教育机会结构进一步阶层化，进而影响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3.2.3 家长教育水平影响家庭教育水平

父母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更能有效利用家庭教育资源，更加重视和了解教育的重要性，能够通过日常交流和互动促进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的改进。K11（张同学母亲）作为高学历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倾注大量的时间经历“课余时间我会陪伴孩子学习、玩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教育减负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孩子多多探索世界，发展兴趣爱好。我们会给孩子提前做规划，孩子未来想从事什么行业全由他选择，我们会给孩子提供足够多的选择机会，也会为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相反，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家长可能在帮助孩子学习方面感到无力，难以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和支持。L12（刘同学父亲）表达了他的力不从心以及对“双减”政策的认同“延长在校时间挺好的，孩子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学校问老师，我们家长也忙，学校多监督孩子也为我们省心了。我们都是初中文化水平，也辅导不了孩子学习，孩子有时候借口用手机查资料我们也没有办法辨别，孩子糊弄我们，我们也不清楚。在学校有老师监督，挺好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部分家长因文化资本匮乏无法有效介入孩子学习，最终形成“政策利好与能力不足”的结构性错位，这是“教育能力落差”问题，可能进一步扩大家庭教育成效的阶层差异。

4 家庭教育投入变化逻辑与教育不平等的生产

家庭教育投入上升反映了其在教育竞争白热化、社会流动需求上涨、经济社会持续分化背景下的适应性调整。差异化的家庭背景与家庭教育水平的差异共同塑造了家庭教育的不平等，揭示出更细微的教育过程差异。

4.1 单向、依赖的家庭教育模式

面对“双减”在落后乡村地区的学校，家校关系主要表现为不稳定的家校联系、家庭被动应对以及对学校的单向依赖。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和教育理念的更新，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但这些家长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使他们只能在较低水平回应教师的要求，并更多地寄希望于子女的天赋与个体努力以及教师的专业技能，无法支撑这一关系向更深入的方向转变。由此，在子女的学业上仅仅依靠与学校与老师，家校间的教育联结较为疏松松散和脆弱，家庭的无力甚至缺位状态使学校和教师难以向家庭借力[22]，部分学生只能靠学校和自己应对教育竞争。

乡村地区整体的家庭教育投入较城市家庭教育投入而言提升不显著。在家长这一端，与城市相比，由于教育资源匮乏，竞争相对较弱，很多家庭对父母责任和角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幕后赞助人”层面，尽管教育环境已经推动着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与行为发生变化，但在具体教育过程中，个人能力限制了他们的持续

投入，以往失败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子女学业表现不佳的“合理”理由，因此缺乏足够动力支持子女的学业竞争，而更多将希望寄予子女的后天努力与学习品质以及教师的权威与技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家长被动应对、单向依赖学校教育的关系，家庭教育的功能难以凸显，拉开了学生间的受教育水平差距。

4.2 双向、主动的家庭教育模式

在“双减”政策影响下，城市家庭教育投入普遍显著提高。在城市学校，家校双方对家校联系基本达成了共识，学校调动家庭力量，由家长分担部分教育任务，家庭把子女学业嵌入日常生活安排之中，不仅配合支持教师，而且力图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为子女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以帮助子女在教育竞争中胜出。在这一过程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稀缺教育机会的主动争取以及父母对子女向上流动的期望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家庭资源为此提供了必要支持。

一方面，学校和教师面临着绩效、考核与升学竞争等压力，既要在与同水平学校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和口碑，还要满足家长对子女优异表现的高度期待。因此，需要家长积极配合教师要求，积极相应学校发布的任务，通过课后家庭教育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的高度分化增强了他们的焦虑，加剧了其对优质教育机会的争夺。大部分家长作为教育竞争的胜出者，清楚地知道教育是帮助子女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家庭教育协助子女参与激烈的学业和升学竞争，支持、辅导子女学业，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方式之一。因此，城市家长的经济能力、知识、时间等资源储备为家庭教育发展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4.3 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生产的影响

差异化的家庭教育投入反映了不同教育环境中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映照出不平等的教育现实。

一方面，随着优质教育要素向发达地区聚集以及教育竞争氛围在其中弥漫，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学校的教育环境和日常运行过程也出现较大差异。就家庭教育模式而言，发达地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建立了双向支持的关系，而欠发达地区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却停留在单向依赖层面。优质的家庭教育能改善子女的学业态度与行为，差异化的教育水平由此产生了教育过程分化。

另一方面，“双减”政策的实施伴随着教育事务的家庭化趋势。教育不再是学校内部事务，还是家校双方的事务，并且围绕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合作，共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教育形成了学校、家庭、市场等多主体参与的教育网络。对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学校只是教育过程中的力量之一，家庭通过参与具体教育事务为子女争取更多教育优势，同时与学校和市场合力推动学生的发展与社会流动；而在欠发达地区，学校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不仅难以激活家庭的行动力，也缺乏市场机构的辅助，学生只能依靠教师和自身表现出的学习能力参与学业竞争。不同的家校关系由此映射出观念不一致的教育现实。

家庭教育投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路径对教育不平等产生了影响。经济条件、父母教育水平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均等，构成了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机制。因此，为了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国家和社会层面干预，在持续推进“双减”政策落实的基础上，颁布实行多元化教育支持政策，减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提供更多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以及增强家庭内部的教育能力和资源配置合理。

5 优化路径探索

“双减”政策的实施显著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缓解了学生和家长对于课外辅导的过度依赖。在具体研究案例中，我们观察到学生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用于休息和发展兴趣爱好，这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身心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政策实施也带来了一些挑战，真正的教育公平需要从优化教育资源分配、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实现教育公平需要政府干预实现，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关注家庭教育投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第一，增强家庭教育能力支持，教育部门应提供更多关于如何在家进行有效教育的培训和资源，特别是针对经济条件较差或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确保所有家长都能在“双减”政策下有效支持孩子的学习；第二，应加大公共教育资源投入，政府要加大对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特别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如建设图书馆、

科技中心等，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减少城乡、贫富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第三，要求优化校内外教育资源配合，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协调校内外教育资源，优化课后服务，如开设兴趣小组、扩展阅读计划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减少对校外补习的依赖；第四，建立家校社三方合作机制，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合作，共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家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等应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共同探讨和解决学生学习和成长中的问题；第五，应当关注政策实施的长期效果，政府和教育研究机构应持续关注“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特别是对教育公平的长期影响，及时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确保政策实施能够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6 结论

如何切实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缓解教育不平等现象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探究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的新问题展开探讨，为推动教育不平等提供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双减”政策为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想要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现解决新问题。一方面，与高收入的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家庭在教育中经济投入有限，其父母的社会资本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家庭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投入不光体现在金钱、时间上，不同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家庭结构的家庭能够提供给孩子的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存在差异。对于阶层较高、家庭背景较好的家庭，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把握更多的教育机会，对于子女的教育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对于阶层较低，家庭背景较差的家庭，他们自身拥有的教育资源少，更依靠学校提供的教育，处于被动地位。“双减”政策虽然有效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看，差距还是很大，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任重道远。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社会进步推动教育进步，“双减”政策是我国共同富裕方针在教育方面的体现，是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的体现。基于上述发现，“双减”政策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引导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教育公平，必须深入考虑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性，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对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支持，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此外，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作的教育模式，共同为孩子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长远之路。

基金资助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研究中心”2025年度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家庭教育策略分化及应对研究（JTJY2025004）

参考文献

- [1] 李煜.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4): 97-109, 207.
- [2] 辛浩力. 国外现代亲子关系理论观点回顾[J]. 教育改革, 1997(2): 32-37. DOI:10.16137/j.cnki.cn12-1303/g4.1997.02.008.
- [3] COLEMAN J S, CAMPBELL E Q, HOBSON C J,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1-743.
- [4] 曹叔亮. 高职教育园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多元竞合模式——基于合作竞争理论[J]. 职教论坛, 2016(13): 20-24.
- [5] 徐菁, 邵宜航, 张子尧. 高等教育扩张能促进向上社会流动吗?——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证据[J]. 教育与经济, 2024, 40(3): 28-37.
- [6] 王琳珏. 我国家庭教育的功能演变与价值发挥[J]. 教育科学论坛, 2024(36): 75-80.
- [7] 刘倩. 社会系统视角下“双减”政策的理论探究、执行困境及其优化[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44(18): 53-62.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4.18.007.

- [8] 王乐. 观念与行动之间: 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展望[J]. 当代青年研究, 2023(4): 90-99.
- [9] 彭媛媛, 葛新斌. 家校教育功能异化问题探究[J]. 教学与管理, 2019(10): 15-17.
- [10] 辛治洋, 戴红宇. 家庭教育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定位[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1(6): 34-41.
- [11] 马陆亭, 郑雪文. “双减”: 旨在重塑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生态[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1): 79-90.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11112.001.
- [12] 王红, 陈陟. “内卷化”视域下“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J]. 教育与经济, 2021, 37(6): 38-43, 61.
- [13] 付卫东, 郭三伟. “双减”背景下的高质量课后服务体系建设[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3(4): 3-10. DOI:10.13972/j.cnki.cn21-1500/g4.2024.04.011.
- [14] 王杰, 来听. “双减”之后: 家庭的应对策略与意外后果[J]. 当代青年研究, 2024(5): 16-25.
- [15] 周琪峰, 韦耀阳. “双减”政策下城市中产家庭教育投资行为转变及其优化路径[J]. 经济研究导刊, 2024(15): 149-152.
- [16] 李海涛. 我国教育不平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统计与决策, 2006(23): 55-57.
- [17] 颜敏, 王维国. 教育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基于辽宁省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科学, 2010, 26(3): 12-19.
- [18] 王晓旭. “双减”政策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效策略研究[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4(11): 115-119.
- [19] 卢晋媛. “双减”背景下家庭教育的应然、实然与使然——基于适性教育理念的省思[J]. 教育科学论坛, 2022(6): 33-35.
- [20] 杨真, 张倩. 教育期望视角下的子女教育与家庭消费——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因果推断[J]. 经济问题, 2019(7): 78-86.
- [21] 谢爱磊. 农村学校家长参与的低迷现象研究——专业主义、不平等关系与家校区隔[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 49(3): 42-56.
- [22] KIERNAN K E, MENSAH F K. Poverty, family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arl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ing[J].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1, 37(2): 317-336.